

# 上海篆刻创作现状和发展研讨会纪要（一）

**徐正瀛**:周建国先生是给我们书协出了个题目,他觉得,其实就是领导关心不够。我个人是这么看:篆刻工作做得好还是不好,篆刻作者的待遇怎么样,书协负有一定的责任,但不是完全的责任,我觉得跟个人的努力也有一定的关系。所以接下来我想请今天市场做得很好的金良良来说一下。书协有没有给过您帮助?具体的大的帮助我估计不大会有,但是人家市场做得很好,经营做得很好,我觉得这跟个人努力肯定有一定的关系。当然您可以不局限于我这个话题,我的建议呢,就是您可以谈谈篆刻创作和市场的关系。

**金良良**:徐老师说市场很好,实现在大环境都不好,我市场也不好。我简单一点说,首先这个展览,我是肯定要来看的。说一个小事情,我进大学读书,开始专业的书法学习以后,我第一个知道的全国大名家应该就是徐正瀛老师。但是那个时候,不像现在网络发达,所以都不认识,但闻其名,不见其人,只是在很多次的展览现场,我就问别人,我说那位是不是,对方说是。所以我就是在很多展览的场合和徐老师打过几次招呼。我这个人的性格,不是那种喜欢跑来跑去的,所以仅限于打招呼。关系不深,但我老早就熟知徐先生,也一直很欣赏他的篆刻,书法好像见得不多。不过近些年来,因为我有徐先生的微信,所以一直能看到他的篆书创作,我一直很关注,因为我觉得书,印在当代能够如此高度的统一,真的是很难得的,这是需要极高智慧的,没有极高的智慧是统一不到一起去的。

再说回来。我大学毕业以后,面临着生计,这是每个大学毕业生都会面临的问题。租房子,地方很小,没有办法写字,所以我选择了篆刻。到现在为止,我的书法创作仍然停留在小型创作上。我加入上海书协以后,极少主动参加书协组织的投稿活动,除了展览。因为我觉得展览,作为一个上海人,是义不容辞一定要去参加的。很幸运的是基本每次都能得到老师的肯定,然后都入展了。因为要解决生计问题,所以我选择了篆刻。所有在大学里所谓辅导班出来的作者,毕业后大多会有一个很痛苦的过程,因为这时候你毕业上的老师同学都不在了,离开了这样的氛围以后,你会很迷茫,所以必须另找老师。当初是由王伟平老师介绍我认识陈身道老师,然后我就跟着他。陈老师是一位好老师,他没有给我做过任何的示范,包括连改印稿都没有。我去跟他学习的时候,他只跟我说哪个好那个不好,然后余下的问题就让我自己去想。另外他会针对我的不足,去找一些资料给我,或者告诉我哪里有,你可以自己去找。其实那个时候,我还是很渴望老师能够给我改一改,希望可以具体到某一个细节。可是陈老师就是不给我改。有的时候,甚至在一张纸上,按照我的要求他写完了以后,纸还不给我带走。他说,这个你就不需要带回去了。我就凭记忆回去改进,我觉得这很有益。现在陈老师也算上海的老先生一辈了。我认识他的时候,他刚退休,上面还有更老的一批老先生。我领略到了老先生的风范。

又扯远了,再回来。因为生计的问题,又恰逢互联网的兴起,所以中国篆刻网、中国书法网、书法江湖等,给了我很好的交流和学习的平台。我就在那个时候,一方面离开学校,我跟着陈老师这样一位不太爱说话的老师,而我是一个年轻人,还是比较爱交流的,所以找到了这些平台进行交流,而且通过交流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很多,进步也快速一点,因为在网络上可以畅所欲言。现在胆子小了,以前胆子还比较大,有点类似于初生牛犊不怕虎。我是做学校老师的,有很多人劝我不要做了。我说要做,一个呢我是看中那份稳定工资。我那时篆刻印是不卖钱的。那時候我也不了解老先生是多少钱一方,什么都不知道。后来才知道,印是可以卖钱的。我记得我最早一方印,大概是50块钱吧,还贴石头,2004、2005年吧。这样走过来,觉得自己在生活上有了—定保障之后,我才逐渐地在所谓的篆刻艺术上投入更大的精力,然后慢慢独立相对自由。我觉得年轻人,其实我也是年轻人,就是他在面临生计和艺术的时候,还是可以做到一个平衡的。我个人觉得,生计是没有底的,你想过得很好想发大财,靠篆刻发大财我是暂时不敢想的。这是我的愿望,因为谁都想过得很好。不过我会坚守一个原则,先把自己的艺术水平提上去,其他事情是慢慢来。如果我自己的艺术水平提高不上去,那后面的事情就不好说,我一直秉承这样的原则。可能有人认为是金良良市场很好,但是我为何说大环境不好?因为我是比较早的直接进入市场考验的一个,好与不好,我心中很有数。恕我直言,有部分所谓的中年以上的,或者再早的,价格里面的水分还是很大的。我呢,承大家厚爱,有一部分订单,但是现在因为大环境不好,我有时候情愿不订,先放着,去写写字。因为我对我物质的要求不是很高,达到小康水平就可以了,我就觉得非常满足了。现在还有大量的一批朋友做书法教学,也不错。教学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,开始了就停不下来。我身边朋友倒苦水说,很想再重新自己刻自己写,但是教学生的问题停不下来,如果不教,就没有生计。我说幸好我选择了这条路,幸好我有教师这个职业,饿不死,然后稍微能卖掉几方,提高一下生活质量,然后就有足够的精力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。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,谢谢!

**徐正瀛**:金良良说得很有意思。生计是我们每一位作者尤其是年轻作者绕不开的话题,除非您家里有矿。我想,现在不仅上海,就全国范围来讲,不仅是篆刻家,包括书法家、画家,都面临着一个考验,就是坚持我的格调宁可没有订单,还是放下我的身价去接一些任务为好?这个话题和我们今天的议题也许没有直接关系,但是会有人感兴趣,我们可不可以请网络推手也是画廊老总还是《财富与投资》杂志主编的叶辉谈一下怎么样?谈谈现在的

市场环境下,一个书法家、篆刻家,他大概应该怎么定位,给我们上海的年轻作者开导一下。

**叶辉**:前几年,书画市场呈现出一种狂热,狂热到哪种程度呢?就是艺术家都忙不过来,忙不过来的不是一个两个、三个五个,可能几百个艺术家都忙不过来。当时我就在想,我们这些做画廊的赚了不少钱,赚了钱都给艺术家送过去了;然后艺术家赚了钱之后,都去买房买车,买不了的就放在家里,他也不买艺术品。这些钱最后怎么流通,这个东西他能不能形成一个循环。所以当时其实我对这种市场狂热,隐隐是有一些担心的,因为这些钱不可能无穷无尽。现在报应来了,就是礼品市场被打掉之后,书法家和篆刻家还好,画家最惨。画家价格跌到哪种程度呢?以北京为首的那些最贵的画家,跌到原来的百分之二十。原来十多万块钱,现在可能花两万就可以买到。书法也跌一些,但是是跌得最少的。

回到徐老师指定要我讲的这个话题,我这里打一下广告,徐老师的书法,最早就是我开始卖的。当时他也是属于忙不过来,现在是忙得过来了,也是市场大环境的问题。对于在座的艺术家,说实话有一些人,能够适应市场的,其实可以适当降低价格。还有一些作者,不降也没有太大关系,因为艺术品本来就是小众的。你想想,你把价格降下来之后,销量能不能上去?其实有些作品比较小众的,可能就是那么多客户。您降价之后,也不见得能多卖多少。因为艺术品市场分两种,有一种像金良良的作品,不需要靠自己出面,只要把作品发到网上去就有人出价,这种作品是可以适应市场变化的。另一种呢,艺术家本来就是需要靠一些手段做一些活动,进行销售。这些作品降价了也就没有什么意义,因为本来他们针对的也不是网络客户,或者说普通藏家。我接触的藏家,那些人都是比人精还人精的,是非常挑剔的。在他们眼里,或许都觉得我的评判水平那都是垃圾,他们自己的眼光才是最高的。他们要藏的是什么样子的,都有自己的判断。你很难对他们有引导,无非就是把我觉得好的给他们看,让他们来进行判断,觉得对就买,绝不是像前些年那样,我说好,他就拿10万块钱走。那时候大家买完了就是投资,他们买完会挂在家里吗?绝不会。他们花了这40万花得很开心,因为他们觉得,花了40万回头一转手,就可以50万、60万再卖出去。大不了今年不卖,明年后50万。纯粹是投资的时候,无所谓是40万,还是400万,还是4000万,没有关系。回到徐老师的话题,其实在没有做市场的时候,价格低一些比较好,循序渐进。但是如果已经做了市场,虽然俗话说“没有卖不出去的艺术品,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”,但是你真的就把价格降下来,原来一万现在一千这样的往外卖吗?我觉得也会出现很多问题。所以我觉得要有技巧地选择,比如以一些形式做一些活动。像徐老师,我自己给您建议了很多次,您也不听我的,我说了没用啊。您现在在书法其实就应该重新规格一下,您的格调跟市场价格比较接近,但是相比之下,有些形式的书法会偏得有些多。昨天晚上结束的一件拍卖,徐老师润格三千,我拍卖卖了两千八,这是最理想的,基本接近。所以这就说明润格、定价一定要科学。其他人也是一样。对于篆刻来说,藏家最接受受不了的,就是篆刻家按字定价,这就没法让人去订制作品,我就只能请您刻两个字(笑声)。字多字少,要研究一种更科学的方式可能更好。我都是瞎说,希望大家别介意。

**徐正瀛**:非常感谢叶辉兄专程从北京赶过来看我这个展览。按理说这个话题跟我们发展篆刻事业没什么关系,为什么特别请他讲呢,我很希望我们上海中青年作者重视市场,因为历史上真正的大家,吴昌硕也好,齐白石也好,张大千也好,都是经过市场考验过来的,而不是竞选什么美协主席、书协主席才奠定地位的。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往市场化发展。希望我们上海作者,既要靠体制,还要靠市场,经过市场考验的价格,才是真正价格,而没有真正价格的艺术家是虚幻的,自己封自己什么大师没有用。接下来请出非常有想法的、一个人撑起一片《篆刻观察》天地的董少校,希望您畅所欲言,不要顾忌,第一我们这里不外传,第二我知道即使外传了您也不怕。

**董少校**:谢谢徐老师。能够有机会和各位篆刻前辈、篆刻同行交流,我觉得非常开心。我就顺着刚才几位老师讲的情况,稍微做一点点小推论,或者说谈一点个人观点的想法。一个是,为什么当四十年代、五十年代出生的上海篆刻家,在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的时候还非常有名,并且能够站得住。为什么现在我们上海有名的篆刻家不多?我想这个不光是篆刻家能力不行的问题,而是说时代在进步,环境在向前,有个水涨船高这么一个情况。我们现在回头看九十年代,大学生很少,那時候交大的大学生刚毕业就能留校当老师了,就能带大一的学生了。我的英语老师当时58年毕业就是这样。现在你想进交大,就算博士也想去应聘,你一定要有海归经历,一定要有项目。现在想想,真是环境不一样了,我们不能简单的和九十年代做一个对比。

我今年做过一个统计,上海有过多多少篆刻家,修订过四版。现在统计大约有400多人,实际上可能更多,但我感觉已经比较接近这个人数了。我们再把扩充一点,可能我们上海能拿出一幅印屏或者发表过作品的人,我估计有500个。能够有名有姓,有出生年月的,我现在能够统计到400。按年龄来看的话大概四十年代出生有50人左右。占最大比例的,不管是从第一版到第四版,一直是五十年代之前。那么我们现在能够举出例子来的,外面的人包括我们上海本地人,一说到上海篆刻的时候,能够说三大家、四大家或者说几大家,全都是四十年代出生的那些人。为什么?因为他们一方面有

老同志的提携,另一方面经过了改革开放初期,他们出道早,一步早了就一直早。我们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来说,五十年代出生的作者,就是一直被他们压着的。有他们这些人在,我们五十年代的人,要想打得响,不是我们能力不行,“不是国军不努力,而是共军太强大”,也是这个意思。我在想徐老师之前接受访谈的一句话,“我对于办这个展览其实也不大重视,周慧珊老师不用办展览也能行”。我极反对这个观点的。包括五十年代的篆刻家,要有一个对市场的认识,对评论界的认识,对历史的认识这样一个过程。如果我们要出头,要提高我们的声望,或者说要得到应该属于我们的那部分,就是要靠出版、靠办展览、靠创作活动,靠这些最基本的艺术活动来实现。如果不办展览、不出作品集,别人怎么知道你?这次徐老师办了这样一个展览,前面至少两位前辈说到徐老师篆书和篆刻的统一,这一点至少通过这样一个展览让上海篆刻界、全国篆刻界知道。徐老师篆刻这个现象在以前可能是不那么明确的,通过海上印社这样一个有学术水准的展览活动,那么这一块牌子就打响了,上海的徐正瀛篆书和篆刻是统一在一起的,是有意为之的而不是水到渠成的!这就是展览的作用,能够让上海篆刻界也好,全国篆刻界也好,重新认识徐正瀛篆刻。我觉得这是很有效、很正规、很正统、很重要的一个方式。所以说我要反对徐老师说的我不喜欢办展览。

对于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篆刻家来说,占到30%左右,也就是400个人里面,大概有110到120个人是五十年代的。六十年代以上的有95个人。也就说这两批人加起来,是绝对主力。数一数上海有代表性的篆刻家,像徐老师,孙慰祖老师,张铭老师,他们都是五十年代的,可能在社会声望来说相对低一点,但是就创作实力水准来说,是不是比陈老屋老师、陆康老师,包括吴颐人老师、童行方老师等来说低一点?我觉得不一定。我觉得接下来,像海上印社就应该做这样的工作,以及篆刻家本人,办合展也好,办个展也好,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是热烈欢迎的。参加这样的活动,我也非常的高兴,我觉得这是振兴篆刻也好,让篆刻界重新认识五十年代的人也好,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活动。

还有一点小的想法。我们说徐老师篆刻出于黄牧甫,但是又明显有别于黄牧甫,这对我们年轻篆刻者是一个很有启发的现象。2017年上海首届篆刻展,我看作品集的时候,有一个明显的现象,就是学黄牧甫的人是最多的,包括获奖的、提名的,还有人展的,都有学黄牧甫的,而且有些人比黄牧甫还黄牧甫。我个人觉得,年轻的时候学一学,学得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停留在这个水平,作为最高目标的话是不合适的。徐老师的篆刻可以看到黄牧甫的影子,但是又明显有别于黄牧甫,能走出来形成自己的风格,是很明显的成功。我就说这些,请大家批评。

**徐正瀛**:讲得非常好!我也是五十年代生人,按董少校的研究,也是属于被四十年代人压制的一族?(笑声)这里有一位老朋友,多少年的朋友了,按现在来讲,也是老前辈了。据我个人了解,他想法非常多,但是他平时不大说话。再不强他说话他要打瞌睡了。我们吴福宝讲几句。您如果讲篆刻不行,讲书法也可以,创作道理是相通的。

**吴福宝**:徐正瀛我七十年代就熟悉了。我们在一个纺织系统中,接触比较多。我现在还留了他一方印,大概是七十年代刚认识他的时候刻的一方小印,肯定跟现在不同了,但是我一直很喜欢。他曾经还给我刻过一对,一方朱文、一方白文,很规矩的,那个时候黄牧甫的东西还不多。我今天看这个展览,黄牧甫篆刻的印比较多,但是又有自己的东西,比黄牧甫开阔和爽利。还有我看到里面有齐白石的影子,但是表现又不同,这是比较难做到的。我们现在不管是写书法的还是刻印章的,他研究某一路的话就被套住了。但是徐正瀛在这里面有自己的想法,这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。另外,上海篆刻界以前说是半壁江山,现在是不可能了。从书法角度来说,也是这样,书法以前也是半壁江山,现在因为外省市发展起来了,上海哪怕正常发挥,也不可能了,过去只能说是历史优势。除非外省市不高这个,那还有可能。

**徐正瀛**:我们请上海著名作家管继平先生。不仅写字,他也写字也刻印的,类似闻一多先生。希望管老师不仅管中窥书,也能屈尊管中一窥篆刻。

**管继平**:刚才大家都在讲上海和半壁江山的问题,我在想,其实上海在那个时候,不光是书法、篆刻半壁江山,什么都是半壁江山,不管电影、戏剧、文学等,全部都是半壁江山。这个跟当时的城市地位有关系。所以说,“半壁江山”必定要说“全壁江山”吗?其实你到顶了就要往下走,不可能越来越好。你到了半壁江山了,你就到顶峰了,然后就要往下走,这个其实也正常。就像写字一样,一个人写字,总归有个顶的,写到了顶,住住就要往下走。当然我们希望能这个顶来得越晚越好,比如说有的人八十岁才到高峰,那就很好;有的人二十岁就到顶了,就不是太理想。

其实我们的人生,所有的动作全是抛物线。你从下面开始起步,然后到顶,然后往下走。射击也是,全是这样的抛物线。一个人的精力、美貌、才气也差不多是这样。我们大家都知道,写字不是越写越好的,有好多人越写越差,什么道理呢?他还是很努力啊,努力却没有反方向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,上海现在没有半壁江山也不要紧,至少曾经辉煌。另外,小地方的人不一样。以前我们讲,上海老先生多、名家多、展览多、印刷品多,什么都多,你看乡下的小地方怎么可能。现在资讯发达了,他坐在家,网络一点,再大的名家召之即来,马上就可以请到他面前来。好的印刷品,哪怕说是下真迹一

等,也照样可以看。这样一来,他跟你的眼界没什么差别了。我们以前有句话,“学霸不可怕,就怕学霸放暑假”。我现在想,“学霸不可怕,就怕学霸在乡下”。一旦在乡下,他的心比你安定,他这个努力程度,我们上海人就很难超过了。而我们上海人应酬比较多,也比较贪玩。人家在乡下,就想我做什么事呢,就学篆刻吧,一下子就超过您了。您不要以为人家在乡下,聪明的人还是有的。我在刘一闻老师这里有很多师兄兄弟,那些外省市的年轻人,像我知道的,辽宁张威、湖南李砺等都很厉害。上海很少有这样的年轻人。当然在座的年轻人都很优秀,但是总的量比不上外省市。有的人真的在很偏僻的地方,但是拿出来的印章你一看,真是不同凡响。八十年代以前,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因为您看不到好东西,您就做不到这样。眼睛没有看到好的东西,手怎么可能刻得好?没有这样的天才的。从来没有看到过好的印章,但是比大家刻得都好,这是不可能的。非要看得好、看得多了,手才能跟上去。所以说大家很担忧,觉得我们上海现在的状况不太好,我倒觉得没什么关系。像冲展也是的,外省市很当回事,但是我们呢,好像不大当一回事。像奥运会一样,中国八十年代刚刚参加奥运会的时候,重视得不得了,奥运会拿一块金牌就是提升你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,多拿一块就给你房子,这就是奖励机制。现在大概不会了吧。可能道理差不多。

我觉得,篆刻要论技法上的提升,当代最厉害。民国好的篆刻家很多,但是民国也有很多篆刻家是玩玩而已,并没有太当一回事。像瞿秋白、闻一多、鲁迅、叶圣陶等,都玩过印章。但是从来没有有人把他们同王福庵相比,王福庵、陈巨来是职业印家,有很多文人印家就是玩玩。中国的文化里,文人天生喜欢和刀有关,过去文人都喜欢拿刀刻刻文字,在石头上刻刻啊,在哪里刻刻啊,这是文人天生的爱好。过去刻印章的人虽然很多,但是对于技艺,没有把它当作很高的追求。所以说当今的篆刻水准,并不亚于前代。中国诗书画,都是前代好,唯独印章未必。可能有些人不同意,但我觉得是这样,篆刻当代第一。

**徐正瀛**:管老师讲得非常好,就是有一点不好,气可鼓而不可泄啊,他认为上海篆刻就像现在的股市一样,处于一种下降通道,而且是一种必然性。而我是希望来一个V形反转。咱们今天很热闹。请杨祖柏讲两句。

**杨祖柏**:今天是来学习的,刚才徐老师说今天这个研讨会不能讲他,其实谈到上海这三十年篆刻,恐怕绕不过徐老师,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。这个研讨会,我是有感而发,这个研讨会确实有示范引领的作用。为什么呢?因为开个展加研讨会在全国普遍,但是很多研讨会都是围绕前面这个展主,说一些好话,大家在一块儿聊聊、开心。今天这个研讨会确实是以研讨为平台,反思、观照上海目前篆刻的状态,以及未来发展的想法。我觉得很好,这应该是具有引领作用的,也是在将来的个展上可以值得借鉴的。前面几位老师谈到上海的篆刻问题,我觉得上海的城市精神,可能对我们上海篆刻也一样,既是目标,也是要求。上海城市精神有十六字,“海纳百川,追求卓越,开明睿智,大气谦和”。我觉得这个城市精神也是对我们搞艺术的要求。之所以提出这个,肯定是针对这个城市不足的地方,反映到我们艺术上也是如此。我们书法篆刻家也应该有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,追求卓越。其实今天这个研讨会就是围绕追求海派篆刻艺术的卓越来反思自己,不管这个研讨会是想唤起一种忧患意识也好,还是为古人担忧也好,都可以给我们启发。

刚才大家谈到的上海半壁江山的问题,我记得市委书记李强同志说过,“上海要打造品牌文化,要成为现代文化的码头”。上海的篆刻,实际上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大码头,但是如何把这个码头做成一个源头?这是一个值得优秀,未来是否全国还会向上海学习,这要打一个问号。我们的前辈,或者说像徐老师这样60岁以上的作者,为上海争得了这个荣誉。但是未来,更年轻的作者能否继承,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。其他我没想到,但是我想到一首歌曲,我要读一下。我不会唱,但是我发现这个歌词很好。因为我们经常说海派篆刻姓海,我觉得既然姓海,就应该想到台湾歌手孟庭苇的那首歌曲《你听海是不是在笑》,这首歌词怎么写了呢,“你听海是不是在笑,笑有人天真的不得了,笑有人以为用痴情等待,幸福就会慢慢停靠。你听海是不是在笑,笑有人梦做得醒了,笑有人以为把头抬起来,眼泪就不会往下掉”。我是有感而发,我觉得我们今天谈的有点听海的意思,有两句话我们经常说的:不要妄自尊大,也不要妄自菲薄,相信上海篆刻的明天会是美好的。谢谢!

**徐正瀛**:不要妄自菲薄,也不要妄自尊大,说得好。现在有请我的同门师兄秦国强先生。

**秦国强**:我们徐兄,他的书法和篆刻相融于一体的个人风格,首先要有创新的勇气,这在我们同门之中是沒有的;第二,他有信心和底气。从他开幕式上讲话的声调和语气,可以看出来。还有一点最重要的,作品中,他有他的才气。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搞书法篆刻的,谁不想成为开风格的引领者?但是没有底气不行,没有才气也不行。

回到刚才所说的海派篆刻,大家已经说了很多了,其实和经济有关。当初在全国,上海经济算比较好一点,有时候以及闲钱可以玩这个。而在好多地方,基本上还是在温饱中,不可能再有闲钱来学字画。上海的特点又比较注重个体,关于海派文化,前辈说得特别好,就是上海人都是各玩各的。到了一个展览,大家就像开party,拿些作品出来挂一挂。回去以后,还是自己玩自己的。刚才建国兄批

评书协,其实书协有它的难处,经费有限。全国其他地方得奖以后,可能会给他换工作,发奖金,现在书协这点经费,全国这么多奖,怎么可能?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一种方式,在全国得到荣誉以后,是不是可以帮他在媒体上、书法通讯上做专题介绍,这样对作者是精神层面的鼓励。以前我们开研讨会,说难听一点,像开追悼会一样。都是说好话。今天这个形式挺好,新颖。

**李昊**:今天这个展览给我印象最深的、引起我思考的,就是徐老师的一种创新性。在当代篆刻的大环境中,如何去拓宽我们传统中已经有的审美深度和宽度?我觉得今天徐老师展览最大的意义,就在这里。提高大家对艺术创作的深度思考,包括对传统的理解和变法。这里提供的信息,无论是对参观者,还是对将来海上篆刻的发展来说,都提供了一个方向性的思考,能不能把我们现在的这些传承,推演出更多的变化?

**李滔**:好,我来说两句。我是徐老师的学生。徐老师是字如其人,印如其人。以我跟徐老师这么多年,从徐老师的书印发展过程来看,我觉得其最大的特点,就是书和印里面有思想、有想法。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想法,你的印就刻不出个性来。任何一个事情的成功,既要有共性,也要有个性,没有个性的创作是不可能形成风貌的。我想徐老师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:个性鲜明。个性鲜明里也有他的思考、他的思想。其次谈谈上海篆刻的现状和发展。上海篆刻的发展我认为很有前景,尽管它不像北京是一个文化中心,但是文化底蕴存在,它不可能发展不好。问题是我们怎么把在上海的、一些来自外地的有才气的年轻人留下来,我想这可能是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工作。第三,艺术是真实感情的流露,篆刻艺术、书法艺术、绘画艺术,所有艺术都是在表达真实的情感,所以重在有自己的想法。我曾经在学校里讲,毛主席的书法创作就很有想法,他就说要有自己的特色。对于篆刻,其实我也是半路出家,这几年我一直刻不好,但是我一直有冲劲,有干劲。徐老师批评我,说我的东西太新了,太有想法了,要停一停收一收。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断找事做,我们“海上小刀会”近些年来就做了很多活动。如果你固步自封,不交流、不切磋,你夜郎自大,你永远都不会进步,所以要交流。徐老师经常讲,书法、篆刻就是多写、多刻,往自己认为好的方面去刻、往自己认为好的方面去写,写出来了,刻出来了,也就是水到渠成。如果对了,那就是大器晚成。

**徐正瀛**:最后请我们上海书协的两位,一位老领导,一位现任领导讲话。先请出上海书协顾问、前上海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戴小京先生,他对我们上海的书法篆刻情况是非常非常熟悉。戴老师先请。

**戴小京**:刚才关注的话题,许多同道都已经谈了各自的观点。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,有些东西不可再造,比如海派文化的高峰,当年那种辉煌,可能是不可再造。因为它已经有这么一个东西,如果复制的话,一点意义也没有。而另外要重新再去开辟一个新的高点,它需要时间。上海历史积淀很深厚,其实到后来也可能成为一种包袱、一种累赘。跟外地很多地方一张白纸比较起来,他们什么都没有,白手起家,可能起来更容易。我们小时候学书法都是学老师的字,当时也不知道深究。后来上海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,破四旧,把那些经典东西都扫光了。那个时候呢,我们上面有那么一代老师,有那么一代先生,他们都在学古人,都学得有一定的功夫。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只学到古人的一半或者一半多,我们再去学学他们,又只到他们的一半,这样就有点一代不如一代。七十年代后期,我在广州读书,那个时候才买到了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字帖。而很多过去书画基础很差、很贫瘠的省份,第一代青年人,正好在改革开放之初长成,他们学书法一上手就是最好的,原生态的东西。大约10年之后,九十年代开始,也就是徐老师在书法报导上写文章的时候,说上海书法在全国有点失落了。那一代外地的,直接学原生态的作者,直接就上来了。而我们相比较原生的有人家那些东西更吸引眼球。所以说,大约是三四届五六届国展开始,上海的名次就往后排了,篆刻也一样。第二个呢,徐老师在开幕式上讲了这个意思,就是最有创造力、最有朝气、最有爆发力、最有野心,应该就是青年向中年走的时代,这个年龄最能进取心,最想得到点什么、获得点什么。刚才那位浙江的朋友,他跟建国讨论的问题其实不矛盾,他说他现在不投稿了,过去一直投稿,逢展必投,那就是一种动力,一种朝气。上海也是,老的作者不管功成名就与否,他到了一定水准也不投了。但是我们现在在二三十、三四十岁的年轻人,投稿量明显落后于全国,你们也没有这个动力是不行的!如果年轻人也不投稿,肯定是不行的,上海的书法篆刻就没有生气了。还有大家刚刚讨论的,关于生存和发展的问题,其实它是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。太富足了肯定是什么事都做不好,一个人要有点动力必须在——不要说绝境,至少在困境下,在这种情况下,是最有动力要改变命运的。

我前年年底到广州开会,我们的标题是“知识改变命运”。其实我是“高考改变命运”。当年恢复高考,是建国以来高考人数最多的一次,500多万,最后录取了27万。为什么?大量的上山下乡知青,为了改变命运啊。不是贬低农村,只是觉得这一辈子如果就当年个农民会有不甘。一个人想进步,在那个年龄段,在那个时间段,也许是最发达的。今天我们要鼓励年轻的一代要有这样的想法。上海这个地方,日子过得有点太好了。有的人认为是生存问题,卢新元老在谈生存,其实我觉得是已经有点过得太好了,过得太好不行的。(下转第4版)